

## “青年 + 哲学社科”: 青年学科发展的方向

■ 郑长忠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 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作为人们对现实社会发展认识的系统化成果, 哲学社会科学的变迁由现实社会的发展所决定。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 社会意义上的青年群体发展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 由此导致研究青年的学科范式也发生着变化。随着网络社会的生成, 青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由此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青年已经不仅仅作为一个对象而是作为一个维度而存在, 从而使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向“青年 + 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 这种发展不仅具有学术研究意义, 而且也将对中国现实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关键词】** 青年 + 哲学社科 青年学科 发展方向 学科范式

就是否存在“青年学”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在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 青年群体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况且国外已经有一些国家将所谓“青年学”确立为学科。因此, 我们国家也应该确立“青年学”, 并将之列入国家有关部门的学科名录之中; 另一种观点认为, 青年作为研究对象, 社会科学既有的各个学科都会有所涉及。因此, 不存在所谓学科意义上的“青年学”, 如果确立“青年学”, 那也应该确立“老年学”等等。我们无意对上述观点做出直接评论, 而是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学术范畴和社会科学与政治、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入手, 在分析青年研究在中国发展的逻辑的基础上, 对青年研究的学科性范畴的变迁特征进行研究, 回答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内涵及其发展方向的问题, 以期为完善青年研究工作提供一些理论思考。

### 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学科与范式演变的内在逻辑

在《哲学的贫困》中, 马克思指出: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 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 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 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sup>[1]</sup>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中,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判断: 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映; 二是理论范畴

收稿日期: 2016-06-20

作者简介: 郑长忠,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青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政党政治、青年组织等。

是对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反映,三是社会现实变化决定着社会科学理论及其范畴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进一步推论:理论与学术发展,虽然具有自身的相对自主性。但是,归根结底,其发展是由政治与社会发展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表现,意识包含意识内容与认识方式,这就意味着,这种决定既体现在理论与学术的整体发展状态上,同时也作用于具体理论范畴与原理内容,以及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之中。因此,我们理解学术与理论的具体内容、学科与范式的实现形式,就必须放在政治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历程中去把握,而不是抽象或静止地去认识。

既然把握理论与学术需要从政治与社会发展入手,那么,我们首先就需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在这方面,马克思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经典的图景与逻辑:“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sup>[2]</sup>这就意味着,在人类社会第一阶段即古代社会条件下,人处于共同体化状态,人与人之间处于直接依赖状态,社会尚未获得分化,不仅社会内部尚未获得充分分化,而且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尚未充分分离。进入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即现代社会条件后,人的独立性获得发展,社会内部也开始不断产生分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野基本形成,虽然目前人类社会还处于第二阶段,但是经过社会深度分化之后,社会内部有机化进一步加强,全球化使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加深,由此导致人们对社会整体性发展的追求再次被提出。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与社会的系统性成果,哲学社会科学也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之基本相适应的发展态势。在古代社会,未分化的整体性社会使人们对世界与社会的认识,更多的是将之看做一个混沌的整体,主要以感性直观和理性思辨从整体上予以把握。这一时期,哲学是唯一的科学,人们将各种学科知识均归属于哲学。从中世纪大学产生到文艺复兴,大学由文学、法学、医学、神学四科组成,神学为四科之首,这四科是现代大学学科的起源。到了文艺复兴之后,随着社会开始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都迫切需要认识这些分化的各部分规律,学科化现象就开始出现,到18世纪,就已建立起初步的科学统一体系,各个学科迅速发展起来,科学活动日益精细化、高度专业化。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理论、新方法大量涌现,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学术创新的主要方向,现代科学综合化、整体化趋势日益凸显,这种现象既体现在自然科学中,更体现在哲学社科里<sup>[3]</sup>。

学科出现与学科发展以相应的范式作为基础,因为范式对学科具有规训作用。一方面不同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范式差异;另一方面同一学科在不同发展时期所形成的范式也不一样。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范式能够维系科学共同体的稳定,提供一种共同的信念与传统,在实践中给出一些固定的解题模型、范例与标准等,规定着一个学科的边界,使学科的边界成为一个清晰透明的领域<sup>[4]</sup>。从范式作用以及变迁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学科就是从某一视角进入对世界与社会进行研究的一个方法体系,或者说是人们认识世界与社会的相对固定的方法;另一方面,学科边界是人为界定出来的,是人们为了深入认识世界与社会而采取的一个方法,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就认为,“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sup>[5]</sup>因此,学科分野并非是固定的,同时学科内部也存在着范式的发展与

变化。这就使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成为了人们认识世界与社会发展的一对内在张力,相向运动着,形成了辩证的统一,这种特征虽然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但是对于哲学社科发展来说,同样也受到了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sup>[6]</sup>。

## 二、从青运史到多学科研究:青年作为对象的 青年学科范式变迁

作为系统认识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哲学社会科学以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对象,虽然其发展有相对自主性,但归根结底,不仅其内容由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所决定,而且其认识方式包括学科与范式的发展也为政治与社会发展所决定。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体现,上述原理具有一般性特点,而落实到具体研究对象以及现实国家中,又将呈现出具体的发展逻辑,我国青年研究就是如此。

在古代社会,青年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一方面,作为共同体化成员的一部分,整体上是依附于共同体的;另一方面,青年更多的是作为劳动力参与了成年人的生产劳动之中。青年作为相对独立的群体被认识与强调是在现代社会之后,因为现代社会:一方面社会分化使青年具有与共同体分离的可能;另一方面现代生产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于是规模化的学校等制度开始出现,青年人就成为“后备军”被建构出来。在中国,大致情况也如此,现代化逻辑导致了青年的“出现”,但现代化逻辑在中国开启,却与西方原发性现代国家存在着差异,导致青年“出现”的具体路径与形式存在着差异,由此导致我国对青年研究的学科进入路径具有了自身特点。

根据费正清先生的观点,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启是“刺激-反应”的结果,即被动的现代化。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现代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开始,为了回应这一冲击,清王朝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推动了洋务运动,在政治层面实施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标志着中国古典政治与社会无法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辛亥革命爆发开启了以革命方式推动中国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建设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作为最为革命的力量与群体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虽然在过去历次战争与革命中,生理性年龄意义上的青年也都是其中武装性力量的中坚。但是在战争结束后,青年又重新回归到既有的共同体之中,并未形成日常性的、作为独立群体的、社会性意义上的青年。辛亥革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作为革命力量,青年一般性地成为了革命的中坚,成为消灭封建、构建现代的主力军之一;另一方面,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因素不断在中国生成,作为现代化成果之一,社会性意义的青年也开始生成,不论是社会分化,还是学校的出现,都为真正社会性意义的青年研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之后,青年既是政治革命过程的产物,更是社会革命进程的产物,由此青年不仅在生理性意义上,而且在社会性意义上,开始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现代化建设以革命方式开启,而青年也是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过程中得以成长,青年、革命与现代化,不仅具有历史联系性,而且还具有逻辑联系性,于是,三者之间就可以作为各自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相互支持的基础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一方面巩固其制度基础以及政党领导基础,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共和国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论证;另一方面为了推动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对现代化发展规律进行把握。这两方面都涉及青年、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于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青年研究是以青年运动史的研究方式出现的。

对青年研究,之所以会从青年运动史角度进入,除了上述政治与社会发展原因之外,从学科

角度来看:一方面,史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最发达”的“学科”,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习惯于用史学的范式来研究青年,同时官方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更是希望大家熟悉的学科与范式,来满足上述政治与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虽然在民国期间开始引入中国,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许多学科就被整顿与调整。因此,对青年问题进行多学科研究尚未具备学科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青年问题的研究除了从青年运动史角度进行外,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对青年工作的研究,主要是以党与国家推动青年的工作以及共青团工作为研究对象。不过,这种研究尚未上升到学理性意义上,更多的还是工作性的经验描述与分析。究其原因,在社会与政治方面:为克服现代化对组织化诉求与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特征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推动社会高度组织化,青年依附于单位,由此,党团建设与青年工作具有高度同构性。在这一时期青年尚未从单位共同体中分化出来,在生存形态上呈现出单位化青年特征,再加上政治性因素使青年问题包含在党团工作内容之中。因此,在研究上,青年问题也尚未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更多是作为党团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另外,从方法论看,在多学科基础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一时期对青年问题的研究无法上升到更为深化的学理性研究。改革开放之后,不论是社会结构还是学科的分类,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从时间上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第二阶段是1992-2000年,第三阶段是2000年之后。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从中国社会发展来看:一方面经济、社会与政治进入复原期;另一方面又启动了初步改革。复原使各项工作开始克服“文革”所造成的破坏,共青团组织与工作也开始恢复。对“文革”的反思以及改革开放使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开始松动,青年主体意识开始崛起,出现了“潘晓来信”等现象,青年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关注,同时,共青团改革问题也被提了出来,1984年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团组织工作座谈会,开启了共青团改革的进程。

从学科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被停止的学科重新恢复。在解决现实青年问题与共青团工作发展的需要与学科恢复的共同作用下,青年研究学科化问题就被提出来。80年代出现了三个与青年研究相关的所谓“学科”:一是青年运动史,这是文革之前研究工作的恢复与延伸,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大批历史资料得到收集与整理;二是所谓青年学,直接以青年为研究对象;三是共青团学,以共青团为研究对象,这是为适应共青团工作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是对共青团工作研究的一种系统化与学科化的努力。

然而,上述与青年有关的所谓“学科”,除了青年运动史之外,其他两个“学科”一经提出,就开始受到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传统研究的学者们。理由有二:一是学科确立不能单纯以研究对象来确定,如果有了青年学,就会有老年学、儿童学等无穷尽的所谓学科,同样有了共青团学,就会有妇联学等等。而传统以所谓对象来确定学科,也有其内在学理性根据。二是学科确立,需要有相应的范式,而单纯以对象为研究的所谓“学科”,很难形成规范的学科范式,更多的也只是借用其他既有学科的范式,成为所谓的交叉性的非典型性的“学科”。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述三个所谓“学科”的发展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造成如此后果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青年运动史衰微。这与其政治性特征有关,这方面的要素被市场经济发展冲淡了。同时与史料集中抢救性收集任务基本完成也有关系;二是与青年学、共青团学的上述自身“学科性”困境有关;三是与传统学科的话语与范式的“霸权”有关;四是与现实社会发展对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的特点有关,这一点将在随后内容中做出具体说明。

不过,我们从青年学与共青团学的出现看到了一个新的逻辑,那就是对青年问题与共青团

工作研究开始由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区分到希望以“学科化”方式予以分开研究转变,这意味着从“一元一体”的政党、国家和社会统合在一起的社会结构状态,在观念与现实上走向政党、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发展,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开始确立。这种基于社会—政治形态发展而出现的团—青“学科化”分化得以发展,虽然在青年学与共青团学自身发展上不是很顺利,但是这一阶段所开启的“学科化”分化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以及对学科化的诉求,无论如何都有价值,都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开启了后来的青年学科性研究的方向与发展。

首先,青年问题被社会学与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学所关注。在学科上,社会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国开始恢复,作为现代社会群体之一,青年群体是社会学既有的一个研究对象,同时社会学具有自己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社会分化开始确立,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开始出现,同时青年问题也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要求我们借鉴国外的情况有效处理青年群体问题。在现实需要与学科基础的共同作用下,青年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对象与领域被社会学所重视,被纳入社会学之中。由此带来了两方面后果:一是将青年问题研究建构成为一个独立学科——青年学的希望与努力被解构;二是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青年与共青团问题研究队伍的主力。

其次,共青团问题经历了由党史党建研究范式向政治学研究范式转变的过程。青运史研究是对发生过的青年运动历史的研究,主要内容是党与共青团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因此,青运史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党史研究范式进行的、以共青团工作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共青团是党的助手与后备军,共青团建设实际上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共青团建设研究也是党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所谓共青团学实际上就是以党建研究范式进行的以共青团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同时,20 世纪 80 年代初,政治学在中国恢复,各类组织与各类群体也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同时,政治学作为一个传统学科也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研究范式与研究体系。然而,由于从 80 年代开始到 21 世纪初,政治学更多地关注中国政治发展重大问题以及相关内容,共青团以及青年问题研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然而 21 世纪初以来,随着政治学发展以及社会与政治发展的需要,一批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对共青团与青年问题予以关注,共青团与青年问题开始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之后,青年问题开始被关注,不论是青年学提出,还是各个学科对青年问题的研究,更多还是将青年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群体,在学科中将之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当然,青年问题作为学科的诸多研究对象之一无法成为各学科的重点,而所谓青年学希望以青年为对象形成单一学科,自身却又没有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只能依靠其他学科的理论,加上在其他学科中青年问题又相对次要,这就导致所谓青年学发展得不是特别顺利。究其原因,除了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之外,很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青年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虽然已经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特征,但是整体来看尚未成为主导性力量,更多是处于后备性地位。社会现实决定观念现实,现代学科发展也是遵循这一逻辑。关于青年研究与学科发展能否发生逆转,关键在于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三、“青年 + 哲学社科”:青年作为维度的 青年学科范式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市场经济建立所带来的,基于制度变迁

而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第二次是网络社会生成所带来的,基于技术革命而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从青年生存形态的发展来看,第一次转型使青年主体性意识开始生成,并且从依附于单位的所谓“单位化青年”,向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所谓“原子化青年”发展。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青年主体意识虽然开始生成,但是传统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学校制度、劳动力的“后备军”地位使学校青年被区隔在主流社会之外,使进入职业空间内的青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第二次转型使青年生存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是互联网导致空间存在发生了巨大变化,虚拟网络空间出现以及虚拟网络空间与现实物理空间的相互建构,使青年人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段突破学校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性区隔,并且随着虚拟网络空间对现实物理空间的影响力加大,再加上青年人运用网络的频度与热情都比中年人高,这就使青年人对现实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二是随着网络社会到来,不论是交往方式还是商业、生产模式甚至话语体系都开始发生了快速的颠覆性变化,而迭代的青年总是最早适应这种迭代式的变化,于是每一阶段的青年总是成为这一阶段的弄潮儿与新的交往方式、商业模式甚至话语体系的最先使用者甚至创造者;三是基于互联网催化以及新科技快速发展,青年人普遍成为了新兴科技领域或者传统领域中的创新性力量。

网络社会生成为青年人所带来的上述三方面变化,从整个社会来说,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权力开始向青年人转移,虽然目前还不能说青年人已经成为了社会主导力量,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来说,青年人所掌握的社会权力已经大大提升了,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在量上的转变,而且是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的质的变化,并且不是一次性转移给一群人,而是将持续地转移给新的青年人。因此,如果认为在农业社会,社会权力掌握在老年人手里,我们称之为老年化社会,在工业社会,社会权力掌握在中年人手里,我们称之为中年化社会,那么在网络社会,社会权力开始向青年人转移,我们可以称之为青年化社会。由此可知,对于社会发展来说,网络社会使青年人成为一种不断与时代相契合的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推动主体与参与主体,使青年人掌握了比工业社会条件下在量上多得多并在质上新得多的社会权力。在网络社会条件下,青年人不仅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成为了最适应网络社会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活跃的力量。因此,青年已经不仅仅是网络社会的一个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了网络社会的一个维度。

作为网络社会的一个维度,青年发展、青年作用与青年问题已经嵌入了社会整体发展之中,成为了对社会整体产生根本影响的一个重要命题。由此,青年就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非常重视的一个命题,青年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是开始作为一个维度受到重视。作为一个对象,对整个学科体系的其他部分可以没有影响,而作为一个维度,那就意味着对整个学科体系及其他部分都将产生影响。从青年研究的学科与范式发展来说,这意味着将发生巨大变化,甚至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

对青年研究来说,我们可能不是纠缠于是否存在一个所谓青年学的争论之中,而是已经到了将青年问题上升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维度来理解的时候了。应该看到,任何一个单一学科都无法独立完成青年研究,因此需要多学科协同,这种协同不是直接针对青年问题,否则还是对象性研究,而是着眼于整体性把握青年问题。因此,未来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应该是“青年+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变化对学科发展来说到了一个重新理解学科内涵和重新划分学科边界的时候了,青年研究对学科与范式提出的新命题,其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青年研究本身,而具有一般性意义。如果说上述内容更多的是从逻辑推演角度上分析,那么,从我国现实研究情况来看也印证了这一分析。从2010年之后,青年问题确实已经引起了各个学科的重视,并且是作为一个维度来关照的。但是,这种现象也才刚刚开始,是否将成为学界一种整体性的自觉,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与推动。

#### 四、是否存在“青年学科”：“青年+哲学社科” 背景下的青年学科内涵

随着网络社会的生成,青年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维度,由此青年研究也应该将“青年+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未来的学科范式发展的方向,既然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究竟是否存在一个所谓的青年学科?

我们的回答是:“既没有却又有。”所谓“没有”,是指不论是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还是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都不能简单地将青年作为一个对象并以此形成所谓青年学科,即狭义的青年学。而所谓“有”,是指不论是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还是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都应该将青年作为一个维度纳入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去研究,揭示青年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包括正面与负面的),既丰富各学科内涵,又发展对青年的认识。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与社会的关系才第一次成为了一个主流问题,才有了在新的学科意义上的所谓青年学科,真正意义上的青年学才被确立起来。不过这是一种广义的新的青年学,这种广义的新的青年学内涵可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在学科内容上,应该将青年作为一个维度,而不是单纯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应该着眼于青年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的关系,即在青年与整体社会、政治形态的关系研究中把握青年,特别是对网络社会条件下青年特征与社会发展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就青年研究青年。实际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本质在关系中才得以呈现出来。因此,即使是作为对象进行研究,也应该将青年放在与社会其他内容以及整体中进行把握,更不用说将青年作为社会的一个维度来研究了。这就要求,对青年作为社会一个维度的内在逻辑进行揭示,将其放在整体中来把握,通过社会变化对青年的影响以及青年新本质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双向互动中来把握青年与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说,与其说是研究青年,不如说是通过青年来研究社会与政治。也就是说,狭义的青年学是以青年为本体的,广义的新的青年学是以青年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为本体的。

第二,在研究范式上,应该开放运用多学科的研究范式,而不是追求所谓单一的学科范式,甚至片面强调所谓青年学的范式。既然青年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维度,那就意味着青年与社会各个部分都密切相关,因此,从多学科与多维度对青年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周延。在推动青年研究时必须开放运用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不必强调所谓青年学的范式,甚至不必过度强调所谓青年学,以免造成学科性的壁垒,导致对青年研究的局限性。同时,多学科之间可以围绕青年与社会政治等关系研究进行范式上的相互借鉴,由此促进各学科的融合与发展。

第三,在组织方式上,应该构建生态化与平台性的研究形态,通过“智慧众筹”方式多维度展开对青年的研究。我们认为,虽然青年作为一个维度的研究在许多学科中已经开始出现,但是尚未成为所有学科与大部分学者的自觉。重要的是这与社会发展中青年作用的发挥虽然已经呈现但是尚不充分有关,同时也与各方面的推动与组织还不够有关。因此,有关部门与青年研究专业机构应该主动承担起推动与组织工作的责任。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组织应该建构一种生态化与平台性的研究形态,而不能局限在传统青年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之中,应该推动高校、其他科研院所、实务部门的各方面人员以及各个学科人员的参与,根据各自特长,围绕青年与社会的关系来开展研究,这就需要在组织形态与组织方式上予以创新。

第四,在研究成果上,应该形成学术成果与咨政成果并重并相互促进与转化的局面。网络

社会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在刚刚生成之中,由其导致的青年化社会发展也只是初现端倪,因此,不论是发展程度,还是基本特征,都有待于观察与总结。对于中国来说,特别是处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及“互联网+”的背景下,学界不仅要重视对青年作为一个维度的社会发展进行观察与总结,还应该将研究成果积极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力量,我们不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这是一种责任,也是时代要求,更是新型的青年学科的本质要求。因此,在成果上,我们认为应该形成学术成果与咨政成果并重,并相互促进与转化的局面。

## 五、在政治、社会与学术之间:作为“青年+哲学社科”的青年学科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次是市场经济建立所导致的基于制度变迁而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另一次是网络社会生成所导致的基于技术革命而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目前,这两次转型都还在对中国产生着影响。对青年来说,前者导致青年主体意识崛起,使青年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后者导致青年发挥特殊作用,使青年成为社会的一个维度。为此,在青年研究上,前者使青年成为研究的对象,后者使青年成为研究的维度。由于两次转型的叠加效应对中国依然发生着强烈影响,因此,一方面必须对市场经济背景下青年主体崛起所产生的后果予以应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对网络社会生成导致的青年作为一个维度的影响进行充分运用,这就使青年研究的两个逻辑都必须发挥作用,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叠加性研究,充分发挥“青年+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以服务于现实的社会与政治发展,使社会与政治在应对叠加效应过程中得以顺利发展。

**结语:**作为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认识的系统化成果,哲学社会科学变迁是由现实社会的发展所决定的。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意义上的青年群体发展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由此导致了研究青年的学科范式也发生着变化。随着网络社会生成,青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由此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青年已经不仅仅作为一个对象而是作为一个维度存在,从而使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向“青年+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具有学术研究意义,而且也将对中国现实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 [ 参 考 文 献 ]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 [3][6]肖凤翔 陈玺名:《学科发展机理探析》,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年第11期。
- [4]陈学东 李 侠:《论范式的学科规训作用》,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 [5]夏禹龙:《科学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